

中国文化与文论研究的困境及其相关性问题的

——以《文心雕龙》研究为中心

刘文勇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中国文化与文论的现代研究走过了一百年,走到现在,似乎已陷入研究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或“虚假进展”的状态,从而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困境。在此种情况下,学界似乎更倾向于以更多的议论或比较的方法去推进中国文化与文论的研究。但实际上,这只会从当下困境走向更大的困境,根本的方法还是先沉潜于传统,深刻了解传统,然后再做打算。

关键词:中国文化与文论;研究困境;相关性问题的;议论;比较方法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1-0100-06

昔人云: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理,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研究。这在一般情况下当然成立,时不同也,不可强求后代同于前代。这当然为现当代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研究不同于传统时代的研究范式提供了依据。但是,时代不同只是为严肃的有实质性进展的研究提供依据,并不会为眼花缭乱看似新鲜实则无所创新而只是在名词术语上翻新的研究提供根据。传统时代的学人研究传统的学问,他们本身就生活在传统中,承续并见证着传统,虽说一代不同于一代,不同时代的学人对传统的体认或有程度上的区别,但大体而言对传统的体认与熟悉程度还不得不令人信服。相比较而言,现当代特别是当代学人在大的背景上却生活在反传统或与传统非常隔膜的时代氛围中,这不能不让人对其研究的能力持怀疑态度。

研究任何对象必须非常熟悉对象,这是基本的道理。时代不同,研究风格与路径可以不同,传统时代研究传统就有汉学、宋学之分野,这是正常现象,但熟悉传统是持汉学或宋学立场的研究者的共性,这却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对传统体认浅近或非常隔膜,却又研究着传统,那么用“一代有一代之研究”来辩护就显得有些勉强了。诚然,我们生活在不同于古人的时代,生活于中西文化杂处或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这为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去研究本国的传统文化与文论提供了新的路径,这要求学者既非常熟悉中国传统也非常熟悉西学,这方面的突破有一些个案,但也多归于前辈学者的名下(如钱锺书、王元化等),而且也不是学界的普遍现象,这说明了传统文化与文论的当代研究处于某种困境。研究的困境往往就是研究者的困境,而这需要与前辈研究者的比较中来见出这困境。

一、研究的当下困境及其相关面相

传统文化与文论是一个偌大的范围,本文无意于也不能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分别展开论说,只是想借《文心雕龙》的研究为契机而荡漾开去,以达到见其一般的目的。

* 收稿日期:2012-05-25

作者简介:刘文勇,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史”(11YJA751051),项目负责人:刘文勇;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论讲疏”(SKJP201101),项目负责人:刘文勇。

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史，张少康、张文勋等曾以专著形式作过梳理（张少康、汪春泓、陈允锋、陶礼天《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张文勋《文心雕龙研究史》，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回顾过去不仅是为了总结过去，也是为了反衬目前与展望未来。观察目前的《文心雕龙》研究当然是我们的重心，但观察起来却是很不乐观的。

“龙学”目前似乎处于一种无法进展或“虚假进展”的状态。一方面，前辈学者如范文澜、杨明照、王元化等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度，要想在他们的治学路径与基础上再上层楼困难重重；另一方面，与目前学者们的传统修养密切相关。目前学界中人大多是 1949 年后出生的，从小开始没有在国学上有过“童子功”，所以有学者戏称 50 至 80 年代这几代人差不多是学术上的“残疾人”，且“重度残疾”似乎也是常态。学者的传统修为与修养是决定研究传统功力的关键，如果此种情况在未来也无甚改观，那么，在未来的《文心雕龙》研究上亦会长期处于无法进展或者虚假进展的状态。

学界学者国学修养普遍不好，故而学界大抵走上了喜好“议论”的路径，与实证学风愈来愈远，以一己之议论代替学术本身，从而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也就处于无实质性进展的状态。与国内的好议论以治《文心雕龙》相比，海外汉学界学风就实证多了。

《文心雕龙》诚然是有理论内容的，现当代多数学者也以为《文心雕龙》乃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故而用理论的研究方法是最好的，因此把各种理论用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到底这些用新式理论研究《文心雕龙》而生产的成果有何价值，不必过早下结论。与此相反的是老一辈研究《文心雕龙》的言必有征的实证学风，如杨明照对刘勰名字的研究，虽然这不是《文心雕龙》研究中的大问题，但仍很实证认真地进行。杨先生引《尔雅·释诂下》的“勰，和也”与《尔雅·释训》里的“美士为彦”来释刘勰的字“彦和”，又引申到古代姓字文化上展开论说，以为“古人立字，展名取同义”^[1]，问题虽小而每一步都言不空发，从而引申到更大的层面去申说。对刘勰籍贯地望的解读也是这样，今人大多以《梁书·刘勰传》“东莞莒人”而望文生义地以为刘勰是山东莒县人，而杨先生却小心翼翼地根据历史材料进行研判，指出东莞郡在南北朝有两个，一是山东东莞郡，一是徐州南东莞郡，“晋太康元年，置东莞郡，十年，割莒属焉。永嘉丧乱，其地沦陷，渡江以后，明帝始侨立南东莞于南徐州，镇京口。宋齐诸代因之。……夫侨立州县，本已不存桑梓；而史氏徂于习俗，仍取旧号。非舍人及其父、祖犹生于莒，长于莒也。莒即今山东莒县，京口则为今江苏镇江。一南一北，固远哉遥遥也”^[12-3]。读这些研究性的论说，让人有信实之感。对史传中称刘勰“笃志好学”一句，杨先生也以坚实证据去推论所学为何物。首先以为“六朝最重门第，立身扬名，干禄从政，皆非学无以致之”，而刘勰所学者，当然也与“立身扬名，干禄从政”密切相关。据此推论，刘勰此期“笃志好学”所学乃“儒家之著作居多”，并继续推测说“后来撰文心以‘述先哲之诰’，其原道、征圣、宗经之浓厚儒家思想，谅即孕育于斯时”^[15]。这对《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中核心思想的解读起到了重要作用，也针对以为《文心雕龙》主导思想是佛教思想的说法给予了有力反驳。史传接下来叙述刘勰“家贫不婚娶”，这句话看似简单而实不简单，一般人容易理解为刘勰因为家里穷而没有结婚，但杨先生却不同意这个看法，详细考证以为“按舍人早孤而能笃志好学，其衣食未至空乏，已可概见。而史犹称为贫者，盖以其家道中落，又早丧父，生生所资，大不如昔尔。非即家徒壁立，无以为生也。如谓因家贫，致不能婚娶，则更悖矣”^[15]。把“家贫”与“不婚娶”二者在逻辑上联系起来是错的，他找了很多六朝的例子来证明，最后证明刘勰不结婚不是因为贫，而是因为笃信佛教。对《神思》篇之“神思”，杨先生亦搜罗材料以证其义，从曹植《宝刀赋》中的“摭神思而造象”，到《三国志·蜀书·杜琼传》中的“(谯)周曰：‘……由杜君之辞而广之耳，殊无神思独至之异也’”；从《三国志·吴书·楼玄传》中的“宜得闲静，以展神思”，到《晋书·刘寔传》中的“平原管辂尝谓人曰：‘吾与刘颖川兄弟语，使人神思清发，昏不假寐’”，再到宗炳《画山水序》中的“万趣融其神思”，最后到和刘勰差不多同时代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的“属文之道，事出神思”，等等，均证据确凿。曹旭深受杨明照研究风气的影响，在谈到他的导师王运熙当年指导他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时，曹旭说：“鉴于上述情况，王老师指导我用杨明照先生研究《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的方法，从最基本的材料入手。他说：‘别人都写的论文，

你就不要写。’当时不懂什么是‘别人不写的论文’，后来知道，这是王老师要求我研究要有自己的个性，花苦功夫，不蹈袭别人。文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没有快捷方式，我决心寻根溯源，从版本和文本开始。”^①创新是靠坚实的证据去创新，而不是空发议论去创新。曹旭以杨先生的研究学风去做《诗品》研究，所得到的成就也反过来说明杨明照等老一辈实证的研究学风之可贵，也可见出目前学界研究《文心雕龙》之空疏学风的根源。

即使对范文澜等在《文心雕龙》研究中有重大贡献的学者，杨先生也以坚实证据驳正其某些看法，以扎实的功夫去推进《文心雕龙》的研究。杨先生针对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说：“成书的时间较早，网罗未周，好些资料没有见到（有的则不可能见到，如元至正本、明弘治本、徐渤批校本、王惟俭《训故》本等）；另外，对文字的是正，词句的考索，也有所不足。解放前，国内外虽曾有专文举正，范《注》又一再翻版，却未见征引。因而书中某些谬误，至今仍在相承沿用，以讹传讹。可见《文心雕龙》这部古典文学理论名著，确有重注必要。”^[2]杨先生在自己的研究中实践了这一方针，如《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中的“德”字，范先生把“文之为德”简化为“文德”，杨先生颇不以为然，拈出《礼记·中庸》“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以乎”等，认为“文之为德”不能简化为“文德”，正如“中庸之为德”、“鬼神之为德”不能简化为“中庸德”、“鬼神德”一样，并以《隋书·文学传序》“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为例证，反复证明“德”即是“用”，故杨先生说：“范注简化‘文之为德’为文德，已觉非是；又谓文德本于‘君子以懿文德’，则更为牵强。”最后得出结论说：“‘文之为德’者，犹言文之功用或功效也。”^[15]这种即使一字一句也咬定不放松的学术研究态度确实令人钦佩，《文心雕龙》整本书无论你怎么去研究，从材料做起是天经地义的事，有过硬的材料则给以有力的论证力驳旧说并陈述新说，无材料则存疑，杨先生在他九十华诞的学术会议发言中还说自己对《文心雕龙》研究了一辈子只搞懂了下篇，《文心雕龙》上篇很多没有弄懂，究其原因，杨先生说是因为刘舍人在《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谈到的不少作品都亡佚了，死无对证，现在研究不了。研究一辈子《文心雕龙》而认为自己只搞懂下篇的杨先生与今日无多少文献功夫而游谈无根自认为对《文心雕龙》研究有很高建树的某些学人，可谓相映成趣。与范文澜、杨明照这一代学人研究《文心雕龙》字字落实言必有据去阐述《文心雕龙》的研究风气相比，当今学界研究《文心雕龙》陷入困境不但是一个事实，恐怕不少的所谓“研究”还有以《文心雕龙》为口实大量推出学术泡沫的嫌疑。

热衷理论或热衷议论，确乎是中国当代的流行风气，这种风气下面治学治出来的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学术成果到底价值怎么样呢？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吗？有学界朋友介绍说刘笑敢研究《庄子》，其《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一书翻译为英文后，西方学界主要关心该书中的“考证”部分，而对其议论部分基本上不关心，这说明其最有价值的部分恰好不是在议论部分，其考证部分倒是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而成为后世治《庄子》的必备参考。这说明西方学界主流仍是实证学风而不是国内流行的“议论”风气。我们还可用长期在海外的余英时的有关论说来证明，余先生认为，美国是一个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大体就有一个市场的取向问题，而也确实有人就利用这一点把学术市场化而迎合市场具有的“趋新”心态，其中尤其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但尽管有这种现象，此种风气仍非美国学界主流，“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他举例说，有一位教授去哈佛大学谋求聘任，在听了该教授的演讲后，这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具体原因是他在演讲的一个小时内用了120次以上的“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这给聘任委员会的教授们以极坏的印象，断定此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余英时对此感叹不已，认为虽然是美国这样的商业社会、流行文化社会，但是学术的实证传统仍然坚固不移，“觉得西方史学家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去维护学术的纪律与严肃性^{[3]314}。

^① 曹旭，诗品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89。曹旭先生此处语句疑有一点问题，当作“王老师指导我用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的研究方法”为是。

真正的研究就是与古代人对话,前提是不带偏见与预设模式。而现在的《文心雕龙》研究大部分都有明显的模式,从好意的一方面去看,可以理解为是受理论影响太深而形成“理障”,从而无法较干净地进入《文心雕龙》的世界进行具体而微的研究;从不太好意的角度去理解,则是学者偷懒,严耕望说:“抓住一种理论模式来研究问题,工作上要简单得多。因为先有一个架子,再找一些材料往上敷衍,就不难。而传统治史方法是要空空荡荡的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建起一个架子,自成一个体系。……这种研究方式自然要吃力得多。避难就易是人类的天性,所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一经引进国内,就成为史学界的新动向。”^[4]按这个说法,中国学者出国或者未出国的,受此种风气影响,到过西方的也大多是学到了西方非主流的看似在西方流行的东西而已,加之近代以来受“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崇西心态影响,回国后介绍于国内学界的也就是这些看似在西方流行的东西,从而在国内引起跟风效应。实证难,议论易,学者大体“先易后难”去学习西方,拿来就是在学问上“避难就易”。

这种研究风气,当然会快出“成果”多出“成果”。从数量看,好像《文心雕龙》研究很繁荣,但实际上可能不但无助于对《文心雕龙》的诠释,反而有碍于《文心雕龙》的真正的学术研究,形成《文心雕龙》研究中的奇特现象,其后果便是朱熹所说的“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的结果。有学者称这种现象叫“倒放电影”的研究,以为这种以今情测古意,以后起的观念与理论去诠释昔人昔书,结果往往便是“主动去‘捉’出一些脱离时代的研究结论”^[5],从而与昔人昔书原初动态真相相去甚远。

《文心雕龙》并非传统中的小学著作,但研究它却需要坚实的传统小学功夫。黄侃说:“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一无可通。”^[6]不仅研究《文心雕龙》是这样,研究传统中的其他著作与学问亦然。王叔岷在回忆1939年夏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经历时,颇有感触地叙述到导师傅斯年对他的当头棒喝。王先生读书时候喜《庄子》,其诗人性情、才子习气颇为浓厚,见导师第一面,呈给傅先生的是自己写的诗,但傅先生问他“你将研究何书”?答曰“《庄子》”,傅先生严肃地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当时的王叔岷不知道学术是什么标准而一任自己的诗人性情,认为:“怎么研究空灵超脱的《庄子》,要从校勘训诂入手?我怀疑有这个必要吗?”王先生那时之所以怀疑这个必要性是尚未入学术门槛之故,而在尚未入门之时就及时受到导师的当头棒喝,当属幸运,否则很有可能就不会造就写出巨著《庄子校注》的王叔岷了,他之所以有后来的成就,在于治《庄子》而没有用“庄子的性情”,其成为《庄子》研究的卓然大家而没有成为“有庄子性情”的一代名诗人,概因有此一段因缘在。而傅斯年当时翻他写的那些诗后所说的“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的话,几十年之后仍然悬响在王叔岷耳畔而清晰流之于笔端^[7]。这是不得不让今日《文心雕龙》研究界与古代文论研究界深思的案例。

“从小学入”当然并不与“从义理出”矛盾,但前提是要有“从小学入”的学术套路与训练,当今学界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大多是“从义理入从义理出”或“从议论入从议论出”,高论看似不少,但能站住脚的甚少,根本原因不能不说是与“从小学入”的功夫缺失有密切关系。这种“从小学入从义理出”的扎实学风几近稀有,即拜“好议论”风气所赐。虽然“从小学入从义理出”是很难的事情,但起码学界要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态才是,但问题是人们往往以“从小学入”为“迂于物而阔于事情”。从今日学界情况观察,大抵是学人们有做“人文思想家”的高远意识,喜欢大场面大结果,但结局却是思想与学术两头皆空,有学者讽刺道:“学术戒律对决定是否‘学者’还更重要。若不讲求学术戒律,专好作大判断,则无论多么关怀现实,最多只能算是‘人文者’,而不能成为‘人文学者’。故我们以为,还是先站稳了‘学者’的脚跟,再谈是否够‘人文’不迟。”^[8]从《文心雕龙》研究情况看,似乎先站稳了“学者”的脚跟是更重要的事情,不要急于去对《文心雕龙》作大判断,而要站稳“学者”脚跟,那就必须要有“从小学入”的功夫。杨明照穷毕生之力研究《文心雕龙》,所走的路径大约就是“从小学入”从而渔猎四部“以治文心”而已,虽然“从义理出”这一面做得并不多也有可能不如意,但站稳“学者的脚跟”确乎是杨明照《文心雕龙》研究成果得以传世的坚实基础。

当然,“从小学入从义理出”的研究成果目前学界也不是完全没有,但不出在《文心雕龙》研究领

域。刘笑敢早年研究《庄子》有成,后来又用十年时间研究《老子》,著《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受到学界推崇,余英时以为该书“将道家哲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考诸《老子》研究史,余先生这一评价并非过誉之赞。该书每章都是“原文对照——对勘举要——析评引论”,这正是“从训诂入从义理出”,把议论建立在坚实的考证对勘的“小学功夫”上,余英时以为刘笑敢在哲学思考之外“掌握了有关古代文本的一切辅助知识,如训诂、断代、校勘之类”^[9]。刘咸炘说:“治诸子之工有三步:第一步曰考校。考真伪,厘篇卷,正文字,通句读,此资校雠学、文字学。第二步曰专究。各别研求,明宗旨,贯本末。第三步曰通论。综合比较,立中观,考源流。”^{[10]5}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共识。刘笑敢的当代成功案例或许能为《文心雕龙》未来的可能进展树立起一个标杆。

除了热衷理论或热衷议论以研究《文心雕龙》的当代风气外,还有热衷从比较文学方法去研究《文心雕龙》的当代现象。与此形成对比,这里特别提出前辈学者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以作简略探讨。王先生此书被比较文学界认作是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方面的力作,但王先生自己却没有这样看待,该书第二版跋说:“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法等)。”^{[11]310}相反,王先生却对所谓比较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在第一版跋中说:“有的同志不大赞成我采取附录的办法,建议我把古今中外融会贯通起来。……但是限于水平,我还没有能力作到这一步。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与其勉强地追求融贯,以致流为比附,还不如采取案而不断的办法,把古今中外我认为有关的论点,分别地在附录中表述出来。”^{[11]304}以王先生对中学、西学的熟悉程度与功力,尚且怕流于比附,这与今日不怕流于比附而前赴后继用比较文学方法去研究《文心雕龙》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象形成的对比,恐怕不得不令人深思。王先生以为:“用科学的文艺理论去清理并阐明我国古代文论,首先需要在前人取得的成果上进行。这里特别指的是版本的考据和校勘,以及文字的训诂和注释。”^{[11]314}回到的还是中国文化与文论自身的逻辑,回到从小学入的基本路径,当然,王先生并不认为应该止于考据训诂之学,他认为应该逾越,但逾越不是只凭胆大的逾越,而是王国维、梁启超那样的逾越与超越:“事实上,自清末以来,如王国维、梁启超等,他们一面吸取了前人考据训诂之学,一面也超越了前人的界限,在研究方法上开拓了新境界。”^{[11]315}从王先生对比较文学方法的谨慎与对传统小学功夫的重视,反观今日学界之以比较文学方法治《文心雕龙》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象,说研究处于困境恐怕并不为过。

二、困境的解除及其相关问题

《文心雕龙》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困境如此,当然需要解困,但解困不是喊口号可以解决的。这涉及众多层面,从中小学教育到大学教育,再到学界学风的整体性扭转等等,都存在着问题。

从国学方面讲,涉及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国家要为未来传统人文学术研究准备人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学功底从小打起是传统时代包括民国时代的传统,所以长大成人后,面对传统大体上能够不需要“假借”若干新鲜的名号而“以艰深文其浅陋”去冒充学术研究,而能直接与古人朴素地对话,能大致上处于和古人水平相差不太悬殊的状态而论次古人与古学。刘咸炘说:“宋人读古书,能知见大而往往失之疏略武断,是不通校雠之故也。近人矫其弊,又专任校勘,但识其小,是所谓我益书,非书益我矣。曾文正谓读古书以训诂为本,吾谓尤以通校雠为本。”^{[10]321}这是把自身就放入传统序列后的一种言说,即所谓“在游泳池中泡着说水的温度”,不是自外于传统而是以局外人的方式言说传统。这种态度的养成,泰半是在中小学教育中去完成。这种态度当然不是要形成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封闭心态,是培养对自己传统的无隔而已,无隔养成后,长大随见识之扩充,对西学也留意后,是能够“能入能出”的。当今急务不是“心态开放”,而是丢掉了置身传统直言说传统的能力,这大约是学界的普遍现象。

再则就是大学教育问题,大学分科过于狭隘同时也过于混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培养出来的人对传统体认不多,同情了解不多。中文系所开的西方文学、西方文学理论都是以“翻译版本”为基础讲授,翻译的东西毕竟不是第一手材料。余英时说:“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

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3]315} 动辄以西方理论比附中国学问,一方面对自己定义得非常狭隘,基本上可以说是以“狭义的文学”来构建自己的,而混淆处则在于名字是“中文系”但实际上关于西方的文学、文学理论的课程等却在课程计划中,而在某些高校里面,中文系的学生似乎更热衷的不是中国自己的而是西方的,这也说明“中文系”名不副实,大抵是可以算作半个也名不副实的“西文系”了,这种情况大体可以说明在大学中文系里对西方的研究也极其不正宗,起码不符合使用第一手材料研究西方的学术规范。所以,实际上,大学中文系叫做“文学系”或“狭义文学系”可能更合适一些。正因为大学中文系体制和构建原则是在“狭义之文学”内涵下完成的,所以,面对中国自身传统时不知不觉就以西方方式而难以从中国方式进入。《文心雕龙》这部书,当代学者动辄当作文学理论著作目之,实际上,研究《文心雕龙》不要有这种学科范围意识,把《文心雕龙》就当作古代的一本书这样综合对待,然后去研究,才更符合传统的状态,现当代对《文心雕龙》研究有公认成就者,泰半是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而这样的心态调整,也需要大学中文系自身观念调整而逐步形成认知。

至于学界学风方面,浮躁的急功近利学风会害了中国现在的学术也会害了未来中国的学术,本来从小未练国学传统的“童子功”就是一个巨大的知识缺陷而陷入“知识残疾”、“学术残疾”了,又加上这比逼债还要急的年年均有的“成果考核”,可谓雪上加霜,学者们想弥补一下本该有的“童子功”也没有这个机会,从而催生大量学术垃圾面世,还号称曰“学术繁荣”。针对这种现象,陈平原在《学界不能全是“短平快”》中认为:“最近二十年,好的人文学著作,大体上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人撰写;第二,长期经营;第三,没有或很少资助。”从这三项条件反推,现在流行的是这三种:“集体撰写”、“短期经营”、“到处找资助”。如果从更远一点来观察,这三条亦然成立。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范文澜、杨明照的成果都是个人撰写的,也是没有受到过任何资助的,但却是《文心雕龙》研究方面的名著与传世之作。杨明照 1935 年本科时就在做《文心雕龙》版本和相关材料的搜求与研究,1936 年至 1939 年在燕京大学读硕士时还是在继续这些工作,直到 1958 年才出版成果,历时 20 年左右,不可谓经营不长。陈平原认为目前的数量考核管理机制对人文学科具有摧毁性打击,他认为“最不适应这套机制的,正是人文学者”,造成的结果是“培养出一大批‘填表专家’……走进书店,大都是急就章,‘好书名’很多,好书很少”^[12]。

高校目前的行政化体制使论文著作的数量变成了大学或大学之下具体院系政绩的体现,这与“GDP 政绩观”同类,更有甚者,某些大学里面把行政化措施贯彻到了教研室一级,使教研室如同当年的生产队,只不过教研室是挣学术工分的生产队而已。年终各教研室根据教学科研等各种表现评比打分,对教研室分出三六九等。学术机构变成这样,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悲哀。

参考文献:

- [1] 杨明照. 梁书刘勰传笺注[M]//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 杨明照.《文心雕龙》有重注必要[G]//中国文心雕龙学会. 文心雕龙研究荟萃. 上海:上海书店,1992:61.
- [3] 余英时. 怎样读中国书[M]//钱穆与中国文化.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 [4] 严耕望. 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M]//治史三书.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50-151.
- [5] 罗志田. 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J]. 社会科学研究,1999(4):104-106.
- [6] 黄侃. 量守庐论学札记[G]//人文论丛:1999 年卷.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7.
- [7] 王叔岷. 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07:48.
- [8] 罗志田. 谁的人文精神? [M]//罗志田. 东风与西风. 北京:三联书店,1998:26.
- [9] 余英时先生序[M]//刘笑敢. 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
- [10] 刘咸忻. 刘咸忻学术论集:子学编[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11] 王元化. 文心雕龙创作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12] 陈平原. 学界不能全是“短平快”[N]. 人民日报,2008-02-18.